

# 司法詢問員擔任專家證人之 實務問題探討

陳慧女

## 壹、前言

### 一、為何需要司法詢問員？

由於多數的性侵害或兒童虐待案缺乏目擊證人，因此受害者的證詞就成為重要的證據來源，從發展的觀點來看，兒童在回憶事件和使用語言的能力具有變異性，不易取得相關事件的實質資訊，故需要司法詢問員（forensic interviewer）協助取得證詞（Hill Country Children's Advocacy Center, HCCAC, 1999; Hill Country Children's Advocacy Center, 2019a; 2019b）。亦即兒童對於發生在自己本身的事件記憶可能受到污染的影響，其被訪談的次數愈多，則證詞的可靠性和法律依據就會愈不可靠（Sattler, 1998）。Vieth（2009）引述心理學家Lauren Flick的比喻：事件就像是一座充滿清澈水質的游泳池，很容易一眼看到底部的構造，但是當兒童每一次接受詢問時就會讓水更加混

濁，如果兒童一再接受學校老師、校長、父母、警察等人的詢問，那麼就更無法看到游泳池底部的實際樣貌。所以，司法詢問的目的在克服這些阻礙，以一種客觀的、對發展的敏感度、有法律依據的方式來獲得兒童的證詞（引自North Carolina Division of Social Services and the Family and Children's Resource Program, 2002）。此目的在確保證詞能接近真實，減少兒童重複陳述的次數，避免證詞一再受到污染，並降低因重複詢（訊）問帶來的多重傷害。

### 二、司法詢問員的法源及角色

我國簽署《兒童權利公約》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於民國103年生效後，基於落實兒童及智能障礙者有效發揮在司法和訴訟體系的參與，保障其行使法律權利與表意能力，如提供程序與適齡的對待使其作為有效的證人，以及促進司法體系

工作人員和警察、監所人員有適當的培訓措施，使其能有效獲得司法保護。因此，在民間團體的倡導下，司法詢問員制度源於民國104年底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法，增列第15-1條規定：「兒童或心智障礙者之性侵害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階段，經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認有必要時，應由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訊）問。但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受有相關訓練者，不在此限。」藉以改善詢（訊）問性侵害被害兒童及智能障礙者的方式，協助弱勢者提供有效的證詞，維護其在司法程序的權益。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1條於106年1月1日施行，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保護服務司於105年開始進行詢（訊）問人員的培訓，培訓具備專業知能的檢警及專業人員。目前已培訓檢警及一般專業人士等兩大系統的司法詢問員，而一般專業人士多為社工、心理、特教、精神醫療等背景。溫翎佑（2019）的研究指出該制度推行之後，對於提升檢警人員的詢（訊）問能力確實產生助益，現行檢警機關仍維持以受過訓練的人員執行詢（訊）問為主，而衛福部列冊的專業人士則以輔助詢（訊）問居多。詢（訊）問工作原本即是檢警機關人員的工作，受過詢（訊）問訓練的檢警人員具備基礎知能，得以應用於偵查實務中；而經培訓成為司

法詢問員的專業人士非具偵辦責任，以協助詢（訊）問為主。

然而，根據臺灣冤獄平反協會的訪談報導，檢察官認為司法詢問員的訓練與檢察官的在職訓練差不多，司法詢問員的法律定位不明，是證人、鑑定人，還是鑑定證人？常須請其簽具多項切結書（社團法人臺灣冤獄平反協會，2020）。顯見專業人士的司法詢問員除了在偵察階段協助詢（訊）問以取得證詞之外，在審判階段的角色定位尚未明確，其協助被害人的角色多重，如傳譯被害人所欲表達的意見、交互詰問時的陪同與轉述、擔任鑑定（證）人兼證人等，以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6-1條第1項：「於偵查或審判中，檢察官或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指定或選任相關領域之專家證人，提供專業意見，經傳喚到庭陳述，得為證據。」所指之專家證人（expert witness）身分。如此多重的角色，經培訓成為司法詢問員的專業人士是否得以勝任？在實務上會遭遇哪些問題？此皆為本制度須進一步釐清及討論的議題。

自從施行司法詢問員制度以來，幾篇探討的論文著眼於司法詢問架構如何應用於兒童性侵害案件（李翠玲、林俊杰，2018；黃翠紋、溫翎佑，2018）、介紹司法詢問員的制度（高瑱娟、尤素芬，2018）、探討司法詢問員的角色定位（關士超，2018）、檢視司法詢問員實施後

的現況（溫翎佑，2019；溫翎佑、黃翠紋，2019），以及司法詢問在法庭外詢問的證據法問題（李佳玟，2019a；2019b；2019c；2019d）等。爰此，本文探討實施至今的司法詢問員實務應用情形、專業人士擔任司法詢問員在專家證人的角色可能面臨的實務議題及建議。

## 貳、司法詢問員的實施

### 一、美國的實施方式

英美的司法詢問員制度於1990年代開始發展，分別由學術單位發展，如逐步詢問法；或是負責詢問兒童的實務機構發展，如兒童倡導中心（Children's Advocacy Center, CAC）、角屋（Corner House）等機構；也有由各州自行發展提供該州使用的詢問架構（黃翠紋、溫翎佑，2018）。一般司法詢問的方式是由受過詢（訊）問訓練的司法詢問員在既定的規劃空間內與被害人訪談，在一個有標準程序的架構下進行非引導式的詢問過程，並全程錄影錄音。美國所發展的司法詢問程序都有著類似的架構，只是有其彈性化程度的差異，有的是完全結構化，如美國國家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機構（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and Health Human Development, 簡稱NICHD）的詢問程序；有的是半結構化，如；兒童優先方案（Child First）（黃翠紋、溫翎佑，2018）。

以下以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為例（North Carolina Division of Social Services and the Family and Children's Resource Program, 2002），說明其針對受到虐待的兒童實施司法詢問的過程為：1.初步會談，首先由兒保調查社工人員在24小時內評估人身安全，決定是否安置並擬定安全保護計畫，此相當於我國目前實施的「兒少安全評估結構化決策模式」（Structured Decision-Making Model, SDM）。其次，由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在特定的環境下進行司法訪談。詢問人員維持中立，以開放、聚焦的方式進行詢問，並以可受司法審查的方式將詢問結果紀錄下來。2.第二次訪談，由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進行，詢問程序是一個由各專業體系相互合作的調查過程，減少訪談次數方可降低兒童的壓力，這個程序類似我國已實施多年的性侵害案件減少陳述作業流程。目的在促使加害人對傷害行為負起責任，盡到保護社會大眾安全之責。

美國在過去剛實施司法詢問制度後有以下影響：（一）司法詢問是否增加起訴或定罪率：在2000年代的性侵害案起訴率為42%，定罪率為75%，但多數是認罪協商的結果，占90%，即便是定罪，也只有19%的刑期超過一年（Finkelhor, 1994）；顯示其起訴與定罪的重點在維護兒童的安全與福祉，懲罰虐待行為是其次。（二）減少兒童受到傷害：司法詢問

有利於維護兒童的福祉，也符合專業倫理道德，最終目的在為兒童建立更健康、更安全的關係，防止兒童進一步遭受剝削和傷害（Vieth, 2009）。

## 二、我國的實施方式

在司法詢問制度實施之後，媒體的訪問報導檢視過去檢警的詢問方式，確實有許多受質疑及檢討的地方（端傳媒，2016）。我國目前以現代婦女基金會引進美國國家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機構所發展的針對兒童的詢（訊）問程序（NICHD）做為訓練的理論與技術。詢問架構分為介紹階段、轉換到實質問題、調查事件、結束等程序，以口語詢問為主，避免使用輔助詢問工具（Teoh & Lamb, 2010）。衛福部自106年起舉辦司法詢（訊）問人員的培訓課程，至109年中旬已培訓約109人，加上推薦的專業人士37人，共約146人（法務部，2019）。由於只有用人單位才能看到完整的名冊，若統計至110年4月大約有160多名司法詢問員（社團法人臺灣冤獄平反協會，2021）。

根據衛福部《辦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1條專業人士培訓及推薦資料留用實施計畫》，課程分為初階與進階課程，初階課程至少20小時，內容為：性侵害詢（訊）問的挑戰與策略（兒童及智能障礙類型，各3.5小時）、性侵害

案件偵查實務及專業人士出庭要領（3小時）、兒童與心智障礙性侵害案件司法實務（3小時）、司法訪談概要（3小時）、司法訪談應用（4小時）；進階課程至少12小時，內容為：司法訪談評估要點（1小時）、司法訪談筆錄評估操作（1小時）、兒童司法訪談實務演練（1小時）、兒童司法訪談結果與經驗整理（1小時）、評估他人之兒童司法訪談錄影及綜合討論（2小時）、智能障礙者性侵害案件特性（1.5小時）、智能障礙者性侵害案件常見問題（1.5小時）、智能障礙者司法訪談實務演練（1小時）、評估他人之智能障礙訪談錄影及綜合討論（2小時）。全程完成初、進階課程者授與研習證書，經過筆試測驗合格者得進入實務技術檢核，通過實務技術檢核合格者，給與合格證書，並納於衛福部的司法詢問員名冊，以供各級機關運用。

## 三、我國司法詢問員的運用現況

根據法務部（2019）的資料顯示，經檢警人員及專業人士擔任司法詢問員的判決有罪的比率為78%。自106年至108年上半年運用司法詢問員的情形及偵審情形如表1及表2，從資料可知使用司法詢問員的案件數逐年增加，且以警察機關擔任詢（訊）問人員為主，這三年來都是超過50%以上。專業人士協助者從106年的13.33%、107年的26.34%、108年上半年

表 1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5-1 條司法詢問員運用情形

詢（訊）問人員	106年 兒童 心智障礙者		107年 兒童 心智障礙者		108上半年 兒童 心智障礙者	
1-1.法院或地檢署親訊	151 (40.48)	31 (37.22)	132 (29.93)	87 (25.44)	62 (33.51)	60 (33.71)
2-1.警察機關訊問： 專業人士協助	19 (5.09)	29 (8.24)	62 (14.06)	42 (12.28)	30 (16.22)	26 (14.61)
2-2.警察機關訊問： 有相關訓練的司法警察	104 (27.88)	86 (24.43)	145 (32.88)	121 (35.38)	55 (29.73)	59 (33.15)
2-3.警察機關訊問： 其他	99 (26.54)	106 (30.11)	102 (23.13)	92 (26.90)	38 (20.54)	33 (18.54)
總計	373	352	441	342	185	178

資料來源：法務部。

表 2 運用司法詢問員之偵審情形

偵審情形	106年 兒童 心智障礙者		107年 兒童 心智障礙者		108上半年 兒童 心智障礙者	
未偵結	57 (15.28)	77 (21.88)	123 (27.89)	124 (36.26)	132 (71.35)	127 (71.35)
不起訴	118 (31.64)	112 (31.82)	88 (19.95)	103 (30.12)	15 (8.11)	25 (14.04)
緩起訴	4 (1.07)	7 (1.99)	4 (1.07)	2 (0.58)	0 (0.00)	0 (0.00)
起訴未判決	38 (10.19)	41 (11.65)	88 (19.95)	55 (16.08)	25 (13.51)	17 (9.55)
判決無罪	19 (5.09)	8 (2.27)	11 (2.49)	3 (0.88)	2 (1.08)	0 (0.00)
判決有罪	137 (36.73)	107 (30.40)	125 (58.34)	55 (16.08)	11 (5.95)	9 (5.06)
總計	380	352	439	342	185	178

資料來源：法務部。

的30.83%，運用專業人員做為司法詢問員的比例也逐漸增加，顯示司法詢問員受到重視。

目前司法詢問應用於年幼孩童及智能障礙者的情形為：若檢察官本身受過詢問訓練則由本身進行偵訊，若未受過訓練

或欲檢核本身所詢資訊，則會使用司法詢問員。如臺灣冤獄平反協會的訪談報導指出檢察官對於司法詢問員是否能問到法律上的要件有疑問等因素，常令檢察官在運用上多所考量，也有檢察官發現司法詢問員所得的資訊跟自己詢問所得差不多，



但還是可能會採用司法詢問員，作為資訊的檢核（社團法人臺灣冤獄平反協會，2020）。可見司法詢問員所受的詢問訓練與檢察官類似，所得的資訊可能差不多，但對於能否詢得法律的要件則令檢察機關有所疑問。

此外，目前專業人員的司法詢問員多半是兼職，因此辦案單位找尋司法詢問員時，可能會面臨時間不一定能配合的問題；加上各縣市的司法詢問員人力分配不均，多集中在台北、新北、台中、高雄等都會區，東部及離島地區的人員過少，必須自其他縣市找人，這些都是未來必須解決的問題（社團法人臺灣冤獄平反協會，2021）。

#### 四、現行專業人士之司法詢問員在法院協助類型

根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1條，認有必要應由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訊）問，係指下列情形：被害人未滿7歲、被害人為中重度智能障礙者、家內亂倫、被害人有發展遲緩之疑義、被害人疑有創傷反應等。其中被害人未滿7歲、被害人為心智障礙者，是最常使用專業人士司法詢問員之情形。顯示未滿7歲兒童及心智障礙者因為發展的議題，包含智能、認知、言語表達的限制，致其證詞陳述能力不足，較需要司法詢問員協助。而如何透過詢（訊）問的過程取得接近真

實的證詞，則是詢（訊）問者的挑戰。

現行專業人士之司法詢問員在法院協助的類型及角色，有以下數種情形：協助翻譯被害人回答之內容、協助被害人反應其被詢問之問題無法理解、協助詢問被害人特定問題或情節、協助提問者再補充或重複問題、協助交互詰問的陪同與轉述、陪同及適時安撫、擔任鑑定（證）人兼證人、司法詢問員兼具證人等（程明慧，2019）。歸納上述角色，包含有通譯、鑑定（證）人、陪同人等。其中鑑定人、鑑定證人，可歸於專家證人，此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或法院於偵查或審判中，得依職權或依聲請指定或選任相關領域之專家證人，提供專業意見，經傳喚到庭陳述，得為證據。此處之專家證人似為專屬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中的專家作為證人之意，而不僅是《刑事訴訟法》中的鑑定人或鑑定證人。顯示司法詢問員作為專家證人的資歷及專業知識與能力，須受到如同鑑定（證）人的檢核。

### 參、專業人士司法詢問員擔任專家證人的實務議題

#### 一、專家證人的意義

專家證人是具有專門知識、技術、經驗、受過訓練或教育的人，能向法官或陪審員解釋他們可能不了解或有關辯護的重

要事項，專家並不是代替法官或陪審團去審判案件，而是以其專門的知識與經驗協助法官或陪審團了解案件的內容（Stern, 1997）。亦即專家證人為具有該專業領域的專業知能，包含知識、技術、經驗、學識、能力等，在法庭作證的目的在協助法官及陪審員了解該專業領域。若司法詢問員擔任專家證人，則是在協助法官及陪審員了解兒童與智能障礙者的發展議題對身心的影響、了解當事人的陳述過程、了解不同工具在詢（訊）問的使用（Vieth, 2009），如畫圖、測驗、偵訊輔助娃娃等。

如以上述英美法系國家對專家證人的界定，應用於我國之司法詢問員擔任專家證人時，則應具備教育（education）、訓練（training）、經驗（experience）（簡稱ETE）（張熙懷，2003）等方面的專業背景，即本身應具備該專業領域的基礎教育、學歷、證照，並接受司法詢問的完整訓練課程、不斷接受繼續教育與督導、足夠多的詢問經驗，並持續累積個案經驗方得以勝任。

## 二、科學證據法則

美國自1993年的道柏判例（*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之後，最高法院提出《聯邦證據法則》（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FRE）五項指導原則做為科學證據的考量標準：1.科學

技術是能被測試的；2.科學或技術曾為專業同儕所審查而發表或出版；3.科學技術的可信度有已知或潛在的誤差率；4.控制專業技術的操作方式有其現存的標準程序；5.在科學社群中，專業技術有被接受的程度。司法詢問員作為專家證人，依此援引科學證據原則即為：專業人士應接受司法詢問的基礎及進階課程的合格訓練、應使用經過研究支持的工具及使用程序、應接受同儕審核、應熟悉並依循國家所認可的詢（訊）問流程指引與標準、應紀錄詢問內容並錄影錄音，但「技術的可信度有已知或潛在的誤差率」這一項在司法詢問則較不易評量（Vieth, 2009）。

依循FRE檢核現行的詢問制度與程序，有以下幾點考量：1.首先，從詢問開始到結束的所有流程、指導語、施行方式等，須有操作的標準程序，此程序能夠詢問出所欲調查的案件事實，亦即能測量到所欲測量的概念與內涵。2.其次，操作程序是可以被不斷重複操作並測試，在不同的時空下具有一致性與穩定度，但是仍有其潛在的誤差率，但此誤差率不會與所欲測量的效度及信度有過大差距；NICHD詢問程序被引進至國內施行，已在國外施行一段期間，有其一定的穩定度，但是在國內實施的信效度如何，可能有文化或執行上的差異，需進一步檢視。黃翠紋與溫翎佑（2018）即指出國內採取NICHD的詢問程序做為主要訓練課程，那麼未來須

表 3 以專家證據原則檢核 NICHD 司法詢問程序

專家證據原則	詢問程序現況
1. 科學技術能被測試。	詢問程序須能夠被重複實施及被檢核。
2. 科學或技術曾為專業同儕所審查而發表或出版。	司法詢問過程須透過同儕、督導的檢核來驗證。未來可透過研究以檢核本詢問程序的效度與信度。
3. 可信度有已知或潛在的誤差率。	不易檢測，但未來可透過研究探索司法詢問實務操作的情形，並檢視文化及執行上的差異，了解證詞接近真實性的程度，探索可能的誤差情形。
4. 控制專業技術的操作方式有現存的標準程序。	詢問程序已有標準化程序、指導語、操作流程，並全程錄影錄音。
5. 在科學社群中，專業技術有被接受的程度。	國外已實施一段時間並已被認可，但引進國內時間尚短，雖已成為國家所認可的詢（訊）問流程，並做為培訓的標準程序。但引進國內，可能有語言、文化及執行上的差異，猶待進一步檢視。未來可經由研究探討其應用的本土化。

有NICHD詢問程序的相關研究，以了解此詢問程序在實務上的信度與效度。3.再則，本詢問程序須透過同儕的檢核、接受督導的方式，不斷檢核司法詢問員的詢問方式及技巧使用的適切性是否符合科學原則，所得證詞的接近真實性如何，以探索其可能的誤差率為何。

茲將上述現行詢問程序現況與相對應的科學證據向度的檢核，整理如表3。

### 三、司法詢問員擔任專家證人面臨的挑戰

Vieth（2009）指出司法詢問員擔任專家證人面臨了應經過認證、遵守倫理守則及司法流程原則、應了解有關揭露性侵害的相關研究、不能完全只仰賴司法詢問、應認識並熟知證據法則、須認知是跨

專業團隊成員之一員並與團隊合作等六項挑戰。筆者檢核國內現行司法詢問員作為專家證人的挑戰，整理如下幾項建議：

#### （一）司法詢問員應經過認證

擔任司法詢問員之前，必須接受理論與實務的培訓課程，這是無庸置疑的。目前由衛福部或由各縣市政府主辦培訓課程，已有一套標準的訓練課程內容、技術演練、考核程序，並規定成為司法詢問員的基本條件。經通過筆試、實務技術檢核合格者，給與合格證書並可納入司法詢問員名冊，此為經過認證的程序。惟在成為合格的司法詢問員之後，仍應透過累積個案經驗、接受繼續教育及督導，增進個人在司法詢問的知能與才能，尤其是對



於有特殊需求被害人特質的了解並精進詢問技術。

溫翎佑與黃翠紋（2019）的研究指出衛福部應建立專業人士管理機制、盤點列冊專業人士的司法詢問能力、對專業人士持續的繼續教育與訓練及督導機制、專業人員應回應檢警與審判機關對司法詢問人才的需求，進一步檢討現行培訓及檢核制度，如現行衛福部的專業人士司法詢問員培訓內容，僅適用於檢警人員之司法詢問訓練，較難產生具有詢問特殊需求被害兒童的司法詢問專精者。故可以鼓勵具有特教背景的退休老師、專業人員培訓成為司法詢問員。

## （二）遵守倫理守則及司法流程原則

既然司法詢問員是一個整合性侵害議題及司法詢問的專業，那麼就應有規範專業倫理道德的守則。建議應盡速研擬司法詢問員的倫理守則，一如家事調解委員、通譯、志工各有其倫理守則，以為實務的指引與規範。

## （三）應了解有關揭露性侵害的相關研究

如何協助確實受到傷害的兒童說出受害事實，是偵查階段所要重視及加強的議題。身為司法詢問員的基本專業要件須具備對性別暴力、兒童虐待、性侵害議題的了解。如性侵害的揭露原因與揭露過程（Morgan, 1995）、性侵害適應症候

群（Summit, 1992）、性侵害的創傷影響（Finkelhor, 1987）、創傷後壓力症（臺灣精神醫學會譯，2014）、家內性侵害的家庭動力等。此外，也須對年幼兒童、智能障礙者、身心障礙者等因發展議題限制其表達的潛在受害者的認知、情緒、身心發展特質的認識，如同溫翎佑與黃翠紋（2019）研究的發現，增進對兒童及智能障礙者發展特質的認識，是專業人士司法詢問員須特別具備的專業內涵。

此外，專家證人主要是熟知自己所專長領域專業的專家，若是超出本身專業能力之外，則勿貿然跨入超越自己知識範圍的領域。且司法詢問員應不斷更新本身所具備的專業知識，隨時掌握最新的專業研究、資訊與法令。

## （四）不完全只仰賴司法詢問

司法詢問程序是透過人去操作詢問流程，所以擔任司法詢問員者，本身就是詢問工具。因此，個人的專業知能、訓練情形、對性別歧視及性別暴力議題的反思、證據法則等之了解與檢視，均攸關詢問的信效度與品質。須藉由全程錄影、透過檢核詢問逐字稿、接受督導等方式確保詢問的確實度。而針對身心障礙等有特殊需求的被害人，有時不能完全以口語溝通，需要借助輔助方式詢問，如電腦、圖卡、手勢、手語、畫圖等，故司法詢問員本身亦須具備非口語的溝通技巧，或透過傳譯協

助溝通。

#### （五）應認識並熟知證據法則

專業人士的司法詢問員須增進對於法院及相關法律規定的認識，如了解司法體系與生態、證據法則、專業領域的相關法令，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刑事訴訟法》等。並對於專家證人的角色有一定的認知，如專家證人在法庭主要是教育者、解述者、說明者、倡導者的角色（Horowitz, Willging, & Bordens, 1998；Stern, 1997）。Stern（1997）列出專家的資歷包括：所受的教育、學位論文、實習訓練、曾參加的特定訓練、曾參加相關研討會、協（學）會會員、曾獲相關學術獎項、持有證照、從事相關研究、發表相關論文、出版相關書籍、擔任相關領域之諮詢顧問等。透過上述之學經歷等專業的累積，專家證人對本身的專業具有自信，並能勝任在法庭上的交互詰問，在法庭上能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說明專業的看法。認知本身的主要角色在解釋說明專業見解，讓法官及陪審員了解專業議題。

#### （六）應認知是跨專業團隊成員之一員並與團隊合作

司法詢問員在詢（訊）問程序中，必須與檢警、法官合作，由於專業人士對於司法的流程與規定並非熟悉，加上法官運

用專業人士協助的方式不同，每位法官可能依據個人方式運用。溫翎佑（2018）研究也指出專業人士與檢警、司法機關的合作要件與程序尚未制度化，致團隊融合不易。故在尚未建立法院運用專業人士模式的情況下，司法詢問員做為團隊的一員，仍須與檢警及法院建立合作方式，如出庭之前與書記官、法官的溝通。藉以建立跨專業領域的合作機制，建立團隊的合作共識，以促進工作流程的順暢（溫翎佑、黃翠紋，2019）。

### 肆、結語

司法詢問員協助兒童及智能障礙性侵害被害人於偵查階段的（詢）訊問，應具有性侵害相關理論、兒童及智能障礙身心發展、詢問技巧等專業知能。在審判階段作為專家證人，除了具備專業知能外，亦須對司法體系及訴訟程序有所了解，並具備專家在法庭上作證的角色與能力。而在制度方面，未來須持續評估司法詢問架構的適用性，檢核詢問程序應用於我國司法及文化體系的信度與效度，並建立司法詢問員的繼續訓練與督導機制，以提供確實、有效能的司法詢問品質。

（本文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關鍵詞：**司法詢問員、性侵害、專家證人

## 📖 參考文獻

- 李佳玟（2019a）。〈司法詢問員證據法問題（一）〉，《法務通訊》2970。頁3-4。
- 李佳玟（2019b）。〈司法詢問員證據法問題（二）〉，《法務通訊》2971。頁3-4。
- 李佳玟（2019c）。〈司法詢問員證據法問題（三）〉，《法務通訊》2972。頁3-5。
- 李佳玟（2019d）。〈司法詢問員證據法問題（四）〉，《法務通訊》2973。頁3-5。
- 李翠玲、林俊杰（2018）。〈兒童與心智障礙性侵害被害人司法詢問模式相關問題初探（上）〉，《法務通訊》2885。頁3-4。
- 法務部（2019）。〈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1條之1之司法詢問員運用情形專案報告〉，《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第4屆第1次會議資料》。頁49-69。
- 社團法人臺灣冤獄平反協會（2020）。〈無聲所在：性侵案偵查的重重掙扎〉，《冤冤相報》80。<https://mailchi.mp/2fb5bb5b8e75/no80>。2020/8/10。
- 社團法人臺灣冤獄平反協會（2021）。〈探問真實：檢視司法詢問員制度的現況〉。《冤冤相報》98。<https://mailchi.mp/daffe6c731fd/no98>。2021/5/10。
- 高瑱娟、尤素芬（2018）。〈我國司法詢問員制度之緣起與展望〉，《社區發展季刊》162。頁85-98。
- 張熙懷（2003）。〈如何詰問專家證人——以刑事訴訟法新制為中心〉。「交互詰問制度對於精神醫學鑑定實務之影響研討會」。2003/10/18。高雄：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 程明慧（2018）。《兒童與心智障礙者之性侵害案件司法實務（回流訓練）講義》。宜蘭：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 黃翠紋、溫翎佑（2018）。〈司法詢問架構運用於兒童性侵害案件偵查之重要性與展望〉，《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論文集21》。頁323-353。
- 溫翎佑（2019）。《司法詢問員制度應用於兒童性侵害案件之實證研究》。桃園：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研究所博士論文。
- 溫翎佑、黃翠紋（2019）。〈臺灣推動性侵害司法詢問員制度之現況與展望〉，《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21。頁16-29。
- 端傳媒（2016）。〈兒童性侵案，「說不出」的傷痛如何挖掘？〉。<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621-taiwan-child-sexual-abuse/>。「Initium Media端傳媒」。2016/6/21。
- 關士超（2018）。《兒童妨害性自主案件中司法詢問員之定位——兼論我國引進兒童倡議中心之可能性》。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著，臺灣精神醫學會譯（2014）。《DSM-5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臺北：合記。
- Davies, D., Cole, J., Albertella, G., McCulloch, L., Allen, K., & Kekevan, H. (1997). A model for conducting

- forensic interviews with child victims of abuse. *Child Maltreatment*, 1(3), 189-199.
- Finkelhor, D. (1987). The trauma of child sexual abuse: Two model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 348-366.
- Finkelhor, D. (1994). Current information on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child sexual abuse. *The Future of Children*, 4(2). Retrieved from [http://www.futureofchildren.org/information2826/information\\_show.htm?doc\\_id=74226](http://www.futureofchildren.org/information2826/information_show.htm?doc_id=74226).
- Hill Country Children's Advocacy Center. (1999). *Forensic interviewing*. Hill Country Children's Advocacy Center Newslett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hccac.org/Newsletters/mayjune99/forensicintervw.htm>.
- Hill Country Children's Advocacy Center. (2019a). *Forensic interview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ccac.org/forensic-interviews>.
- Hill Country Children's Advocacy Center. (2019b). <https://www.hccac.org/>.
- Horowitz, I. A., Willging, T. E., & Bordens, K. S. (1998). *The psychology of law: Integrations and applications* (2<sup>nd</sup> ed.). New York: Longman.
- Morgan, M. (1995). *How to interview sexual abuse victim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North Carolina Division of Social Services and the Family and Children's Resource Program. (2002). What is forensic interviewing? *Children's Services Practice Notes*, 8(1). Retrieved from [http://www.practicenotes.org/vo;8\\_no1/what\\_is.htm](http://www.practicenotes.org/vo;8_no1/what_is.htm). 2019/11/5.
- Sattler, J. M. (1998). *Clinical and forensic interviewing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 San Diego: Jerome M. Sattler Publishing, Inc.
- Stern, P. (1997). *Preparing and presenting expert testimony in child abuse litigation: A Guide for expert witnesses and attorneys*. CA: Sage Publications.
- Summit, R. C. (1992). Abuse of the child sexual abuse accommodation syndrome.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1, 153-163.
- Teoh, Y. S. & Lamb, M.E. (2010). Preparing children for investigative interviews: Rapport-building, i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14, 154-163.
- Vieth, I. V. (2009). The forensic interviewer at trial: Guidelines for the admission and scope of expert witness testimony concerning an investigative interview in a case of child abuse. *William Mitchell Law Review*, 36(1), 186-219.